

关注蔬菜安全

——对中国山东寿光蔬菜基地的农业商品化、科学技术、道德的人类学分析

摘要：蔬菜安全问题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部分，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笔者对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山东寿光市进行参与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在农业商品化、科学农业实践和道德风化转型背景下的蔬菜安全问题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在调查中，作者对当地菜农、村干部、农资超市销售人员、种子公司技术员、育苗场工作人员、收购中介、收购商、蔬菜市场销售人员、当地村民等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并且对蔬菜大棚、有机农场、菜市场、超市、饭馆和农户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通过主、客位两种视角的分析使我形成了“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完整画面。本文的目的在于带来一种关于蔬菜安全问题的不同声音，揭示当地人是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并且如何对此问题做出反应的？本田野研究代表了为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和深入了解蔬菜种植、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多个过程提供人类学证据而迈出的第一步。

关键词： 蔬菜安全； 农业商品化； 科学种植； 道德实践

Contemplating Vegetable Safety:

An Ethnography on Agri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Scientific Farming Practices and Morality in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arm-to-table food safety continuum, vegetable safety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social life in China. Based on participatory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in Shangdong's Shouguang region which has the largest vegetable production base in the country, my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vegetable saf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ongoing agri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scientific farming practi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ral landscape in rural China. During my investigation, I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vegetable growers, cadres, villagers and town residents, peddlers and merchants and visited vegetable fields, green houses, markets, stores, restaurants, and farming households. The intimate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my informants and consultants have enabled me to develop a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actually happened on the ground. The purpose of my paper is to bring multiple voices to bear on the issue of vegetable safety thereby revealing how different local actors perceived food safety and reacted in different ways. My field research represents the first solid step toward providing ethnographic evidence underpinning food safety policy making an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faceted process of vegetable plantati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Vegetable Safety; Agri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Scientific Farming Practices; Morality

一、蔬菜安全问题研究意义之所在

“绿色蔬菜”、“无公害蔬菜”、“有机蔬菜”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话语。这些充满科学技术色彩的字眼,在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健康食品和生活质量的追求和重视程度的同时,也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普通民众面对饮食的不安全性的无奈和担忧。本文所关注的饮食的不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德国社会学贝克在其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中所着力解析的一种由人类实践而导致的风险(Beck 1992),一种与运用知识和技术来改造自然世界直接相关的“人工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

这种由于饮食的不安全性而导致的地方上男女老幼空前的风险意识,本研究者田野调查地可谓感同身受。一个菜农的5岁的小孩会指着一根黄瓜对我说:不要吃,这是 nao nao (药药)。童言无忌,一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在一个小孩眼里竟然是一支毒药,这是怎么一会儿事呢?虽然蔬菜安全问题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是否严重到这种地步呢?2010年以来的“毒豇豆”、“毒韭菜”事件将对这由来已久的问题的关注再次推向了高潮。

受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的就是问题蔬菜的产地,严格检测“豇豆”、“韭菜”各方面的安全指标,一旦查出就被销毁,销毁活动进行的轰轰烈烈,菜农则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虽然心疼,但是撞到了枪口上但也没办法。这引起了我的深思,将有问题的蔬菜销毁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农民明知道农药有毒为什么还要往蔬菜上喷呢?他们就是那么的没良心吗?蔬菜到底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以前这种问题虽然存在但是没严重到这种程度?菜农对蔬菜的安全问题是怎么看待的?自己又是如何应对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了解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天方夜谭。我带着一系列的疑问进入了田野。本文以认识田野地蔬菜生产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利用“如影随形”、“解剖麻雀”的田野观察方法,对当地的菜农、农资超市人员、种苗基地技术员、蔬菜收购中介、收购商、零售商、当地居民进行了访谈,对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和工作环境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最终了解“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引起了我们所吃的蔬菜存在如此严重的安全问题以及当地道德实践的变化?

本次田野地选在中国山东省寿光市的某个以蔬菜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自然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发展蔬菜大棚种植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作为全国蔬菜产业的代表,每年都会在此举行“国际蔬菜博览会”。同时2010年所发生的青岛“毒韭菜”事件中的韭菜正是从寿光市稻田镇输出的,因此选择寿光作为田野地无论是在蔬菜质量保证方面还是在安全问题方面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其次,所选的自然村从1985年左右开始种植蔬菜大棚,至今也已有25年的历史,此村因为种植蔬菜大棚也带动了本村其它行业的发展,如:农资超市、蔬菜收购中介、人力劳雇市场、种苗基地……目前,本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蔬菜生产和输出链,此村可谓“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最后，带着蔬菜安全这一敏感性问题进入田野，不得不考虑进入田野地的可行性，关系在进入田野时是非常重要的。而作者“本地人”的身份以及所处家族关系和对当地风俗人情的了解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即建立与被访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实践中，作者是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在场”身份，出现在田野调查的各个场所。这一研究体验本身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作者得以借哈佛法学人类学家莫尔(Moore)的洞见，对于蔬菜安全这一“诊断性事件”(Diagnostic Event)进行缜密和细致的考察、梳理和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在原有结构被渐渐化解之时，来自地方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新结构的力量在进行多轮角逐并提出不同的文化诉求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合乎规范的不确定性”(参见Moore 1987)。作者籍此比较容易的收集到各方面的材料，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为对蔬菜安全问题的“深描”积累素材，为在食品安全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背景下解决蔬菜安全问题提供一种人类学的思考方式。

二、蔬菜商业化促使由追求“吃头”变为追求“商品性”。

要想了解蔬菜安全问题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则离不开对蔬菜生产发展历程分析。在访谈中可以发现，当地蔬菜生产的变化主要是从种植蔬菜大棚开始的，在此之前，本村人每户都有自己的“大田”¹和“园子”²，吃的菜都是自己在园子里种的，当时种类很少，夏天种类相对较多，但主要是豆角，冬天主要就是大白菜，很少存在安全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三元朱村村民王乐义引进蔬菜大棚，并在寿光逐渐推广开来后，寿光多数自然村都是采用了这种经济模式，此村也不例外，70%的农户都有种植蔬菜大棚，近年来村里的蔬菜大棚已成规模。村里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靠的就是种植蔬菜大棚。分析蔬菜商品化的过程也就是分析蔬菜种植业发展的过程，因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蔬菜种植业以及其带动的其它行业的产生都是在为蔬菜商品化创造条件。

(一) 蔬菜种植方式变化：低投入、低产出----高投入、高产出

现在走在的蔬菜大棚之间，就像走在一座座的高房子之间，墙体就有2米厚，足以阻挡冬季强劲的北风，进入大棚内也不用像80年代初建时期进入大棚时那样担心自己会被碰到头了，这是看到蔬菜大棚时最直观的感觉。通过对以下两个不同时期的个案比较能够很明显的看出当地菜农在种植蔬菜大棚上最直接的变化。

个案1：桑家，1989年建的第一个大棚仅仅四五十米，花费1000元左右，主要是包括帮忙的邻里的饭钱、大棚的材料(钢筋、柱子、薄膜、铁丝、竹竿、土、麦秆、种子、化肥……)，其中帮工的饭钱占到所有费用的1/5，因为当时没有雇工，也没有钱来雇工，

¹ 大田，种植玉米和小麦的粮食的农耕地。

² 园子，种植蔬菜的农田。

周围多数都种棚，所以一般是四五户人家合作，互相帮忙。当时一季大概能卖 2000 元，虽然现在看来不多，但是 2000 元在当时来说是很值钱的，买的东西也多。

个案 2：吕家，2010 年刚刚建好了一个 70 米的温室大棚，一共花费大概 60000 元。其中包括：挖掘机挖棚：80 元/米*100 米=8000 元；钢筋、铁棍等 16000 元、竹竿 2000 元、薄膜 5000 元、棉帘 10000 元、卷帘机 6000 元、埋柱子雇工费：50 元/m 米*80 米=4000 元，小钢丝、铁丝、小竹竿、肥料 3000 元，菜苗 0.5 元/棵*4000 棵=2000 元。现在每户人家大概有 2-3 个棚，每个 70 米左右，一年收成好的能买到 7 万-8 万元。

从以上不同时期蔬菜大棚的投入、产出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在花费数额上，现在菜农在蔬菜大棚上的投入基本上是过去的 50 倍，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个数字可能会小一点，即便如此，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出过去的投入与现在是无法比拟的，因为 60000 元相当于在当地建一座具有 300 平方米居住面积的两层楼房 1/3 的价格，为什么当地农民愿意在自己舍不得盖好房子的情况下，却愿意“玩棚”上投入这么大的数额呢？如果对比着看一下现在与过去的收入对比，答案就很明确了。因为高投入意味着高产出，到目前为止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了菜农种植蔬菜的目标。

（二）蔬菜出售方式的变化由零售转为批发，市场不断扩大。

2000 年-2004 年左右，走在大马路上经常会看到在路边的沟里看到成筐的西红柿、芹菜等来不及卖的蔬菜，每一筐西红柿都有 300 斤左右。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让当地的菜农把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红柿宁愿倒在路边也不拿去卖掉呢？而这种情况在最初种植蔬菜的几年以及近几年都很少看到，这又是因为什么呢？通过被访者对蔬菜出售方式的访谈，我们很容易知道答案了。

个案 3：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004 年前，卖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活，之所以种不了太多的菜就是因为卖不了。那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大板车和自行车。每天下午把菜摘好运回家，如果不需要再加工就直接装好，如西红柿。有些菜，如：芹菜，需要再次加工，邻里回来家里帮忙一捆捆的弄好。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要骑自行车载着 300 斤重的菜到寿光的蔬菜批发市场卖掉。买不完的就用自行车载着去赶集，在集市上零售卖掉。由于蔬菜成熟的时间不同，一般会连续十天这样卖菜。像西红柿这样不易保存的蔬菜，就会因为来不及卖而坏掉，这也就出现了 2002 年前后，经常会在路边的沟里看到一筐筐的西红柿被倒在里面的情况。渐渐的交通工具有所改善，到今天由自行车经历了脚蹬三轮车、机动三轮车、摩托三轮车变成了机动四轮车、面包车。再后来，卖菜不再需要到寿光，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卖。因为 2003 年左右开始有大量的外地蔬菜收购商来到村里收菜，因为寿光各个乡镇中的蔬菜品种是相对集中的，田野所在地就是有名的西红柿之乡的一个村，所以收西红柿的车就可以

直接来到村了收了。刚刚出现这种流动收菜的时，货主一般会自己带着小工到大棚里摘西红柿，因为有些品种的西红柿不易保存，所以一定要现摘现买。由于货主的小工也是雇佣的，所以菜农在采摘的时候会偷偷的塞给小工一点钱，然后让小工不要把关太严，可以把小的、形状不好的西红柿也装进箱子里。近四五年来出现了蔬菜收购中介，主要的任务就是为蔬菜收购商收菜，菜农只需要把蔬菜卖给自己村的收购中介就可以了。

农民要想获得蔬菜的价值，必须将所种植的蔬菜出售出去，这就依赖于市场了。在菜农的描述中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市场两个字，但是外地的大客户会跑到小村子里来收菜，这说明了当时市场的扩展。这与 2002 年，寿光开始召开国际蔬菜博览会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次博览会的召开是寿光蔬菜走上全球化道路的开始。在这次博览会中，寿光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签了大量订单，随着市场的迅速扩大，当地菜农的蔬菜的出售不再成为问题，出售方式也由过去的零售、零售与批发相结合转为了完全的批发，菜农只管种菜，只要种出来就能直接卖掉。这时决定农民收入多少的唯一瓶颈就是蔬菜的产量问题了。

（三）整个村落的蔬菜产销是想分工专业化、系统化。

由于蔬菜业的迅速发展，与之相关的一些行业开始被带动起来，这些行业的发展为蔬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有些行业是一直存在但是附属在其它行业下面的，而随着蔬菜业的发展已经自己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如农资超市，过去农药是和其它生活用品一样都是可以在供销社买到的，2000 年左右田野调查村出现了第一个农资超市，里面专门出售蔬菜需要的各种农药、肥料、喷药工具……到目前为止该村已经有 5 家左右的农资超市，其中很多是连锁店，规模最大的是德农超市。

还有的是外地甚至是跨国公司自己进入，在当地建立分公司。例如本村最大的育苗场——荷兰瑞克斯旺种苗公司，2001 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2006 年在本村建立育苗基地，目前已经是当地最大的种子公司之一，每年种苗产量在一千万棵左右，本村菜农种植蔬菜的种子多数是从这个育苗场买的，虽然价格贵，但是考虑到外国种子的商品性比较好，还是愿意花大价钱购买。据保守估计寿光市种子市场的 50% 已经被外国的公司如：瑞士先正达，美国孟山都、圣尼斯，荷兰瑞克斯旺、德瑞特、安莎、纽内姆，以色列海泽拉等种业巨头所控制。

另外，当地具有生意头脑的村民适应形势的需要自发形成了一些新的行业，例如：蔬菜收购中介、劳雇市场。其中蔬菜中介是随着 2002 年后外地客户进入村子大批量的收购蔬菜开始出现的，中间人的存在可以更好的协调蔬菜收购商和菜农之间的关系。从蔬菜收购商的角度看，他们对于当地的情况不了解，有时很难收起一大卡车的菜，同时自己所收的菜的质量很难把关。而中间人在当地建立一个蔬菜收购市场，可以提前把菜收好，等到卡车到村里

就可以直接装车了，这大大的减轻了时间成本。从菜农的角度来说，既免去了去寿光市区卖菜的麻烦，同时避免了过去蔬菜收购商收菜赊账时的担心。同时收购中介的出现也使得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中介在当地建立收购市场，市场上有两种雇工，一种是当地种棚的菜农，他们可以鉴别收来的菜是否存在毛病，把好质量关，每个工人鉴别的蔬菜包装外面都会标有鉴别人的姓名，如果蔬菜收购商把蔬菜运到目的地发现问题就可以直接追查个人。另一种是没有事做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工作就是把鉴别好的蔬菜装箱、包装。

以上这些行业虽然有不同的分工，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点，那就是蔬菜。现在，整个村落的不同职业都成为了蔬菜产业上的重要环节，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销系统。村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去所有的村民之间都是家族内的亲属关系或不同家族之间的乡亲，现在随着蔬菜的商品化，又多了一层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或雇佣关系。经过近 25 年的发展，此村的整个蔬菜产业上的农民已经脱离了过去种大田为生，农忙时相互帮忙，农闲时做做零活、一起消遣的日子，逐渐在蔬菜商品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角色，整个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都在忙。

（四）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当地蔬菜商业化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为了促进蔬菜业的发展当地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工作包括：修路，寿光市各个村子在九十年代中期就都通了柏油马路；调整土地使用政策，将过去只能用于种植小麦、蔬菜的大田用于种植蔬菜大棚；资金上支持，各农业银行可以为菜农提供贷款建设大棚、购买农资物品；召开国际蔬菜博览会，为寿光蔬菜创立品牌，开拓市场；建立蔬菜科技园，里面有专门的技术员开发新产品，并给予菜农技术上的支持；国家为运输蔬菜的货车开通绿色通道，免除关卡费用。政府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大大的促进了寿光蔬菜业的发展。寿光蔬菜基地这种“由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从以上蔬菜商品化的过程分析，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问题的存在，所看到的只是当地蔬菜业成功发展，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当地农民生活不断提高。而蔬菜安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用当地菜农的一句非常朴实而又具商业性的话总结就是“现在种的菜‘吃头’不好，但商品性³好”。蔬菜商品化使菜农认识到在市场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不断增加蔬菜的产量，适应客户对商品的要求，这就需要在种植蔬菜时购买可以长出大小均匀、色泽鲜艳的抗病毒转基因的种子、定时打预防各种疾病的农药，哪怕是蔬菜还没有生病，为了使得蔬菜“抗运输”，在蔬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摘下来，然后等蔬菜运到目的地，再催熟，当蔬菜到达超市的架子上市时就成了好看的样子。而顾客餐桌上的事情是

³ 商品性：在当地菜农和收购上看来主要是指生产的蔬菜的产量高、大小均匀、色泽好、抗挤压、抗运输、易保存。

与菜农赚钱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自然也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了。在这样的蔬菜商品化的背景下，出现蔬菜安全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科学技术使蔬菜商品化成为可能，蔬菜安全问题伴随而生。

蔬菜实现商品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市场，另一方面需要蔬菜产量的不断提高，要想实现产量的增加，科技是动力。从蔬菜商品化的过程的分析似乎应该是菜农为蔬菜安全问题负责，因为是他们种植的蔬菜，选用了转基因种子、往蔬菜上喷洒农药，导致蔬菜中有大量的农药残留，使得安全问题加重。但是如果深思一下农民是如何知道种菜要用转基因种子、化学农药、有机农药、生物农药、肥料、催熟剂的呢？他们想增加蔬菜的产量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详细的了解一下农民使用农药的历程，似乎会有更深一层的答案。农药的使用由来已久，在种植蔬菜大棚以前，利用农药给粮食作物除草、除虫是很普遍的，通过对菜农所使用农药的演变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菜农是否是蔬菜安全问题的最终负责人？

个案 4：被访对象农资超市老板任某在本村开农资超市已有十年，见证了农民使用的农药的变化。据说，在本地发展蔬菜大棚以前，在园子里种自己想吃的蔬菜、水果，种上以后一般是不需要管理的，最多浇浇水，也没有多少病症，一般情况下就是浇浇水，雨季不浇水也可以。那时也没有多少农药可打，另外买药还得花钱，所以如果生了虫子一般就是用手捏死。后来开始种植蔬菜大棚，但是这时种植蔬菜的目标不再是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而是将其作为商品，成为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人们种植蔬菜不再追求“吃头”，主要是关注产量、价格。

八十年代末开始种植大棚时，多数人都是自学成才，种棚和在菜园子里种菜是一样的，只是在大棚里充分地利用光，增加蔬菜的可种植时间，其它的种植技术都没有变化，因为那时的蔬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病菌、虫害。

大概从 2000 年左右，蔬菜的病菌和虫害不断增加，如：串皮虫、地蝼虫、根线虫，随着蔬菜病菌虫害的增加，与之相关的药物也开始出现，开始时用的多是市场上出售的剧毒性、高残留的化学农药，如：1605、敌敌畏、“黑药”。被访对象表示，现在的病虫病菌很多都是有国外传过来的，早年并没有这么多的病菌，这些病菌都是通过空气土壤传播的（个人觉得现在多数的蔬菜品种都是国外研发出来，又在当地推广的，所以最初通过蔬菜的种子传播病菌是极有可能的）。另外像根线虫这种虫害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被访者桑某表示种了 20 多年的大棚，虽然周围很多人家都有这种虫害，但是她家一直没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她的经验，只要别随使用很多农药，特别是别在没有这种虫害的时候用预防性的药，地里一般不会有这种虫害的，越是早预防的越是会出现这种虫害。即便在出现根线虫的时候用上药，也仅仅是

管一季，到第二季种植的时候仍然会生，恶性循环。桑某曾经和寿光的一名技术员到宁夏推广种植蔬菜大棚，而这名技术员就推荐当地的人用“复硒唑”这种预防根线虫的药，实际上对于刚开始种植大棚的地方来说，土壤和空气都没有被病菌污染，没必要用药的。这可能与这名技术员也是农药销售商有关。

05年以来，多数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已经渐渐退出市场，使用的多是有机农药和生物农药，这些农药的残留量低，毒性小，对人的身体危害相对较小。但是由于近年来的病虫、病菌越来越多，使用的农药也越来越多，每种蔬菜从种植到收获，每个不同的阶段都要使用相应的农药。现在可以选择的农药也是越来越多，农民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农药也不知如何选择。一般是由经销商介绍决定。如果购买的农药没有以前的高毒农药效果好，农民还是会偷偷购买。

通过对菜农种植蔬菜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变化历程可以看出，农民可以说是选择空间是非常小的，基本上时生产出什么样的农药和肥料就用什么样的。农民只是把科学生产的农药用于蔬菜的一个中介，具体用高毒性的农药还是无毒的，用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都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没有科技农药，菜农怎么办呢？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蔬菜种植的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病菌、虫害与越来越高端的农药也是分不开的，农药越厉害，产生的病毒抗体也会越厉害，如此循环，结果只能是蔬菜中的农药残留会越来越多，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农药，反而会产生良性循环，存在的病毒虫害会比现在少很多，菜农也不用花很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在农药上，蔬菜的安全问题也会少很多。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也是有自己的调适性智慧，有时为了节省成本，除了使用农药除虫外还从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土方，例如：在每年的7月份，蔬菜收完后，将棚上的薄膜撤掉，让大棚内部经过风吹日晒和雨淋后，再种下一季蔬菜的时候里面的病菌和虫害就会少很多。因为雨水的碱性比较强，具有杀菌的作用；另外通过通风也可以将里面的病菌吹散。但是由于每年都把薄膜扯下来花费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做了；草木灰可以杀死鼻涕虫，因为这种虫是靠体表分泌出一种粘液爬行的，如果倒上草木灰，就会使体表的粘液失去作用，最后虫子会窒息而死；具有辣味的蔬菜会抗根线虫，如果在棚里栽种辣椒的话，根线虫就会少了。所以如果没有农药的情况下，农民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应对措施的。

当然科技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有些科技发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正如蔬菜安全问题，所以把责任简单的推到农民的身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科技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在高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旗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科技发

明对人类甚至是整个地球会产生不良影响。科技人员也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在新的发明进行或实施以前应该做好充分的考虑。

四、针对蔬菜安全问题，同为农民，不同的声音。

随着蔬菜安全问题成为了社会焦点，蔬菜安全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在访谈中我发现即便都是农民，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态度的。聆听不同的声音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一个事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提到蔬菜安全问题，人们会很快想到“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当我们问当地的菜农什么是“无公害蔬菜”时，菜农会很肯定的说，他们种的就是无公害蔬菜。因为这里的蔬菜都是被蔬菜收购商装进标有“无公害蔬菜”的箱子运走的，所以这里的菜都是“无公害蔬菜”，吃了不会有问题的，出现安全问题的蔬菜一般都是特定的蔬菜，如韭菜、黄瓜，这些蔬菜的成长期短，用药重，吃了难免中毒。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还得到了菜农的好心提醒，“在城市里少吃这些菜”。自己吃的菜，不重视菜的卖相，所以可以在大棚里种一些不打农药的。由此可以看出，“无公害蔬菜”确实只是一个符号，也许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是安全蔬菜的保障，知情的菜农觉得就是普通种植的菜。

而菜农对“有机蔬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谈到“有机蔬菜”时，知道当地存在有机农场的人是确定存在真的“有机蔬菜的”，但是他们认为种植“有机蔬菜”的成本太高，利润又小，在当地卖不出去，所以表示不会种植的。而不知道当地存在有机农场的菜农，则认为不存在真正的有机蔬菜，认为现在种菜都会用药的，即便有机蔬菜用的有机农药、有机肥，蔬菜中也会有农药残留的。所以，种植“有机蔬菜”是不现实的。

而有机农场的技术人员则认为现在除了有机蔬菜都是很危险的，吃普通蔬菜大棚里中出来的菜，“吃的不是菜，而是药”，而“有机蔬菜”是可以让人们放心吃的。但是当问及有机农场的推广能否解决全国的吃菜问题、有机蔬菜的价格能否让人接受时，有机农场的技术员表示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成本很高，不是普通人能够吃的起的。现在订有机蔬菜的消费者主要是高收入阶层，普通的中产也不能接受，中下层更是不可能了。

农资超市的售货员表示，“蔬菜安全问题是很难解决的，现在的人都考虑赚钱，不太关心别人的死活，要想真的管好这个问题，政府必须严格规范农药市场。现在政府相关部门虽然表面上要求严禁卖高毒、高残留农药，但是每次在检查时，都会提前通知经销商，这样在经销商有所准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查到违禁农药的。”而菜农应该要讲“良心”，不应该用那些高毒的农药，有时到了该打根线虫农药的季节，但是有的人没来买正规的农药，那就是通过黑市买“黑药”了。

村里的不“玩棚”的居民，对蔬菜安全问题多是一笑置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些菜吃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活的好好的。”另外表示，农民没有城里人那么娇贵。有机蔬菜太贵了，也没必要吃，那些打药多的菜少吃点就行了。

以上四类不同的农民对于蔬菜安全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此问题所持有的态度不同，虽然蔬菜安全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但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在蔬菜商品化，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的背景下，菜农种植低利润、高成本、市场小的有机蔬菜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农民的公民意识相对淡薄，只要事不关己，得过且过，没必要较真；再次，政府相关部门与农药经销商利益紧密相连，监督不严格，农药市场不够规范。

五、关于蔬菜商品化中道德实践的讨论

蔬菜商品化不单纯是经济性的，也是一个包含政治、法律、文化和个人道德的内容。当我们谈及蔬菜安全问题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利欲熏心的施药者，觉得他们所做的已经突破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和职业道德。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秩序和约束确保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因此对蔬菜商品化过程进行道德的反思也是必要的，此举并非是要限制蔬菜商品化，而是限制蔬菜商品化过程中潜在的缺陷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确保个体的行为不要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在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蔬菜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分析蔬菜安全问题产生的道德原因对于整个农业商品化过程中避免相关的安全问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菜农无从用以往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

蔬菜商品化对蔬菜生产的产量要求增大，科学技术为农民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但是菜农对起了巨大作用的科学技术并不是非常的了解，科学技术的话语也没有对农民开放，这就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在选择农药或种子时，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选择是否符合道德。例如：在田野的过程中，我所访谈的菜农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使用的国外的种子是转基因品种，而对转基因蔬菜是否对身体有害更是无从考虑了。而购买农药时，现在的农药都标榜是无毒、低残留，具体会怎样，农民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与道德事实相关的各方面事实的了解是进行道德判断的先决条件，科学技术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农民对所做出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道德判断。

（二）农业商品化的转型中出现了道德失范。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虽然没有一套成文的农民职业道德，那时食品卫生问题也存在，但是很少存在这样的大规模的有毒食品或农药残留蔬菜的安全问题。因为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所生产的食物是供家庭内部成员享用的，家庭外的食物也是在熟

人社会中流动的，如果生产的蔬菜是有安全问题，是不能食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菜农在种植商品化蔬菜的同时，也会留出一块地，专门种不打农药的蔬菜供自己家或周围的亲戚邻居吃。在蔬菜商品化的初期，蔬菜流动的范围也是相对有限的，多数菜农会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的蔬菜，集市所集中的人一般是 5 公里以内，5 公里对于当地人来说也算是一个熟人社会，因为从当地通婚范围上来说绝对是大于这个距离的。同时菜农与蔬菜消费者之间是面对面的交易，多数人之间都是熟悉的。如果出售的蔬菜有问题，很快就可以找到出售的菜农，同时也会传遍周围的村子，这种舆论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蔬菜迅速实现商品化后，从蔬菜出售方式的个案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在的菜农已经不再担心蔬菜的市场，多数蔬菜可以直接从大棚运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菜农不知道自己种出的蔬菜是由谁吃，消费者也不知道蔬菜出自谁家的大棚。菜农与消费者之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市场的扩大使得以家庭为核心范围的道德不能在其作用的范围以外发挥其在熟人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了。而菜农在利益的引诱下，使用大量的农药增加蔬菜的产量，只要蔬菜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就不会有人直接追究到责任人。因此在农产品的传统生产环境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失效，而又没有产生明确的适合商品化背景下的农产品生产的职业道德的情况下，产生蔬菜安全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在农业商品化的社会转型中产生行业范围内的职业道德是必需的，当然这种职业道德不仅仅是针对农民的，还包括科学领域、商业领域。因为“没有道德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功能。否则便只剩下个人的欲求了，既然这种欲求本来就是无限的、无法满足的，倘若它得不到控制，也肯定不能控制自身。”随着农业的商品化，经济生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并开始占据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任何能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活动形式，要想不陷入混乱无序的形态，就不能脱离所有明确形式的道德规定”。（参见涂尔 2000：12-13）至于我们到底是如何产生符合农业商品化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则需要人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爱弥儿·涂尔干著，渠东、付德根译. 2000.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罗秉祥. 1996. 繁星与道德. 唐山出版社.
- 3、 王志振. 《食品安全，我们还要走多远》. 《环境保护》. 2008. 第 4 期。

英语文献:

- 1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London:Sage.
- 2 Moore, Sally Falk. 1987. Explaining the Present: Theoretical Dilemmas in Processual
- 3 Ethnography. *American Ethnologist* 14(4):727-736.